

19世纪澳大利亚华人与宗教

唐琳璠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长久以来, 以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是海外华人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第一代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华人为了在激烈的谋生环境中站稳脚跟, 通过社团等形式结成帮派, 为了将多样化的个体利益整合在一起, 单靠世俗力量是无法约束, 因此宗教因素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儒、道、释的文化遂成为了澳大利亚当地华人身份认同的标识; 同时, 受到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亦在华人群体中广泛传播, 这对于华人接触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礼仪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华人华侨; 宗教

中图分类号: K61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0X (2015) 05-0077-04

Australian -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in 19th Century

TANG Ling - fa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the core of religious multiculturalism is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to set foot on Australian land foothold in the intense environment to make a living, the group formed by associa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help, in order to integrate a variety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together, secular forces alone can not be constrained, and therefore involvement of the religious factor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became an Australian local Chinese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be affected by how far Australia's culture, religion and other Western Catholic Christianity also widespread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hich for contact with Western culture, learning Chinese etiquette West had a positive impact.

Key words: Australia;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n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澳大利亚自始就有着多元文化的色彩。由海外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带来了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信仰, 这正是澳大利亚“东方与西方联姻”多元文化的体现。而宗教——这一人类社会发进程中特殊的文化现象, 构成了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风俗习惯、思维模式等, 宗教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持观念的投射。^{[1][P1]}而以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是海外华人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

目前有关海外华人宗教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东

南亚地区的华人, 如吴文华、黄新宪、张禹东等人对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特点的研究。^[2-4]进入21世纪, 学界对华人宗教的研究开始从探索华人宗教与中国文化渊源转向与本土文化兼容与发展的问题上, 如张禹东、旃媛媛等人在总结华人宗教的历史基础上更加注重华人宗教与现代性的研究。^[5-6]相较而言, 有关澳大利亚华人宗教文化主要放在华人社团文教的大背景下, 鲜有系统的研究论著。作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侧面, 华人的宗教文化的研究对于理解十九世纪第一代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情况、对当地文化适应程度

收稿日期: 2014-12-18

作者简介: 唐琳璠 (1991—), 女, 江苏南京人, 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联邦史。

以及华人社会的身份情感认同上有着重要意义。

一、澳大利亚华人社会与中华传统宗教

十九世纪初,随着澳大利亚羊毛业的迅速发展,新南威尔士等地牧羊业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开始雇佣华工。到十九世纪中叶,澳大利亚金矿开采范围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广东省省会及其周边13个县的华人移民澳洲,追寻他们的“黄金梦”。至1850年,澳大利亚总人口为405356人,其中华人有近1000人;1853年,澳大利亚华人约有3000人。^{[7] [P9-P10]}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到1891年,澳大利亚华人已达35821人。^[8]

十九世纪是第一代华人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起点,是华人社会形成并在澳洲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这些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单靠个人力量解决不了新环境下碰到的各种问题,于是他们通过社团等形式结成帮派。但如何将多样化的个体利益整合在一起,单靠世俗力量是无法约束的,而宗教的内容一旦被部分人所接纳,便会在团体中形成一套共同的价值。因此,宗教信仰上的共识能够凝聚人们的力量,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海外华人以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为核心,基于中华传统的道、儒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又杂糅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文化信奉方式,或创造或改变融合当地历史文化特色,形成了一种儒道合流并以庞杂的民间神祇为主要对象的多神信仰,这样,中国的儒道释文化顺其自然成为了澳大利亚当地华人身份认同的标识;同时,随着西方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清末时期国人已经接触到接触相关教义思想,之后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更是深受西方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亦在华人群体中广泛传播。因而,早期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主要信仰的有儒道、佛教及基督教(包括天主教)。

在淘金热的驱使下,19世纪50年代第一批华人移民大量涌入澳大利亚。当地的欧洲白人认为大量的中国矿工来澳使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加之传统的种族歧视观念,当时的华人承受着劣等种族、异教徒的指责和煎熬。到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的许多殖民地更是制定了反华法案,限制华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这给华人在澳大利亚生存和立足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些早期的华人移民为了能够在澳大利亚激烈的谋生环境中站稳脚跟,融入主流社会,不得不借助民族传统势力以实现其自保的目的,因而华人社团的出现正是华人集结力量同舟共济患难相助的产物。华人移民通过同

一姓氏或是同一地方的血缘和地缘纽带的作用下结成帮派,但是,社团间各个成员利益整合单靠世俗力量的约束远远不够,因此“宗教因素的介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9] [P72]}基于宗教的民族性及共同的宗教文化圈,中华传统的宗教文化遂成为早期联系澳大利亚华人的重要纽带之一,同时也是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

所谓中华传统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文化综合体,它包括了华侨华人所信奉的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道教、儒家文化和民间宗教信仰。重视礼佛拜神,祭祀祖先,华人通过共同的祖先或共同的神祇祭祀,利用超自然力量来加强群体控制,加强帮派组织的团结。因此这一时期在澳的华人建立的神庙、宗祠往往和某一人群的社团机构相结合,如澳大利亚最早的中国会馆——墨尔本的四邑会馆,1856年于南墨尔本绿宝石山兴建了一座占地面积广、规模宏大的会所,其中并建一座小型关帝庙祭祀关公,同时设有供奉先人神主牌位的祠堂。大门的“四邑会馆”四字是由张之翰所题,大殿祀关帝,有多处联匾“允文允武,至大至刚”、“万古英雄存大义,千秋德泽惠群生”、“正气长留宇宙,丹心直贯古今”。中间正殿祭祀都天至富财帛星君。新会人陈大瑛所题联为“远今送神麻,天下财源归锁钥。庶黎颂圣德,人间利路总枢机。”^{[10] [P147]}

当时悉尼也有两处中国庙宇,一是四邑关帝庙,它是悉尼最早建成的一座华人寺庙,建于1898年。正殿前有1905年刘子修所题一联“奇花竞妍,幽鸟相逐;清泉见底,奇峰入云。”右祭祀关帝,有三副对联“精忠昭日月,正气壮山河”、“大勇大忠加四海,至仁至义推重光”、“大地几英雄,碧血丹心,千古云霄思汉鼎;天涯有桑梓,春椒秋菊,一堂风月话乡亲”;二是洪圣宫,始建于光绪32年,岁时令节都华人都会前来祭祀。布里斯班的三圣宫于1885年由五位粤籍华侨所建,建筑材料均由中国运来。1893年布里斯班发生水灾,三圣宫幸免于难,增加了其神秘色彩,香火不绝。除此之外,巴勒拉特的四邑、南海、番禺及顺德籍华侨各建一座庙宇。本迪戈有大金山庙,供奉孔子、关公、诸葛亮。庙北有华侨先民祠。在寺庙祠堂中,帮派会定期举行集体宗教祭祀活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包括四邑会馆和冈州会馆在内的一些华人社团“指派委员会成员一年两次前往祭堂主持祭拜已故移民,一年三次崇祀关帝”。这些习俗在澳洲四邑华人社团和会馆中至今仍然存在。^{[11] [P158]}

对于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移民而言,中华传统宗

教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群体社会层面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对于个人,传统宗教成为他们克服“终极挫折”的重要精神支柱;对于群体社会,作为宗教系统的整合资源,它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不同帮群的关系维系和凝聚,是通过共同的传统宗教文化来加以调整和整合的。其次,华人传统

宗教是华人会馆、宗祠、宗亲会的建立和运作的重要基础。第三,传统宗教信仰是华人社群关系整合的重要推动力量。正如《墨尔本四邑会馆》章程中可见,章程中明确提出会馆的主要任务之首便是“建造庙宇,崇祀先贤”,“建造义祠”,“并设春秋二祭,为纪念亡友之用”。^{[11] (P158)}

表1 1891年澳大利亚各州佛教徒及总人口比例^[8]

新南威尔士	维多利亚	昆士兰	南澳	西澳	塔斯马尼亚	澳北区	澳洲首都领地	总人数	%
10,120	6,746	—	3,936	1,089	826	—	—	22,717	1.2

同时期,佛教也随第一批华人移民传入澳大利亚。据统计,到1891年,佛教徒占澳洲总人口的1.2%,其中大部分是来澳淘金的华人(见表1)。佛教在华人之间的传播也为许多移民尤其中国移民提供情感认同的资源,同时佛教亦将亚洲各国传统与文化融合渗透到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与文化之中。

二、华人与基督教

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西方宗教也随列强进入中国。在移民澳大利亚之前,本土华人已经接触到了基督教。早期澳大利亚华人多信儒教佛教和道教,兴建庙宇以关帝和财神为多,随着新移民的涌入,他们不断融入澳大利亚当地文化氛围中去,信基督教的华人也逐渐增多,信奉基督教亦成为华人另一种适应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形式,华人教堂也开始兴建。

1859年,在卡斯尔梅恩建立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所华人教堂。教堂每日下午及周日都会举行礼拜仪式。这些中国教堂除了向华人传授圣经外,同时也教授华人英文和西方礼俗。在悉尼和墨尔本,许多基督教华人教堂设立了夜班,并在星期日向华人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教授读写英语、算术、烹饪等。《圣经》常常被用作课本。华人为使自己适应澳洲社会并受澳大利亚人欢迎,很乐意接受基督教,相当数量的华人接受洗礼,许多华人也应信教摒弃了吸烟赌博等陋习。在白人教士培养下,产生一些华人教士。各教会向中国人传教的目的,除了希望在澳大利亚的华侨能够信教之外,还旨在意图训练中国牧师,再派遣他们返回中国从而将教义传向中国大陆。因此,在广东各地的许多教堂大多是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华侨捐款建立,其中也有从澳大利亚返回中国承当牧师的华人。之后在拜恩斯代尔等地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教堂,且多由中国牧师主持。信教华人数量也逐渐增多。1860年,维多利亚长老会开始对中国人传教工作,建立教堂传授经义,在

墨尔本唐人街的中国教堂,教徒就有500人以上,由一名华人牧师主持。

圣公会和天主教随之也对中国人开始了传教工作。1901年到1921年间,圣公会的华人信徒最多。这归功于当时的牧师张卓雄。他自幼接受英文教育,1888年在墨尔本授委为圣公会的牧师。他不仅可以将圣经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并且能背诵希腊文的经文,因而深受澳大利亚人及华人的尊敬。张牧师长期从事传教活动,热心为侨胞服务,并且多次撰文和演说指责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歧视华人的政策。他还主张禁食鸦片。1880年之后的四十年,张卓雄牧师已作为维多利亚州华侨领袖和发言人,多次代表华人上书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建议。1878年,他撰写了《澳洲的中国人问题》一文,详论了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中国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并劝告澳大利亚政府不要歧视华人。

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华人传教工作远不如维多利亚州发展得迅速。1882年,长老会任命周扬威为牧师。在他的带领下,华人教徒大幅增加,之后在悉尼成立了两处中国教堂,在西悉尼、纽卡斯尔和梅特兰等城市的中国教堂也在不断增加。悉尼长老会于1910年12月新建圣堂。悉尼华人侨商马应彪、郭标和马永燦等联合赠送了一块金子匾额“其道大光”悬挂于教堂内。新南威尔士州的圣公会在1880年后,任命华人牧师向中国人传教,并在市区建立教堂。到1891年,圣公会有中国教徒1871人,远比其他教会中国人数多。到1901年时,基督教已经在华人中打下一定的基础,维多利亚各教派华人数已占到华人总数的28.5%。^{[12] (P316)}

早期澳大利亚华人信奉基督教有助于打破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华人能受当地人欢迎的一个主要途径。华人开始重视澳大利亚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价值,基督教会的活动成为华人接触澳洲主流社会的一个窗口。中国教堂的牧师,不仅履行着教堂牧师的职责为华人提供精神慰藉的同

时,并且积极投身于华侨团体的公益事业中。他们中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擅长英文,深受广大侨胞的信任并被推选为侨团代表。每每听闻国内有自然灾害时,这些教堂执事就会率先发动捐款等义举。中国教堂另一项工作,是在教堂开设中文读经班,兼授中国语文,向在澳大利亚生长的年轻一代华侨传授中国历史文化等课程。不少澳大利亚华侨青年的中文知识是仅靠教堂传授习得的。同时,有些在教堂慈善机构工作的欧洲妇女通过工作与华人妇女和华人家庭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华人妇女和孩子有机会接触主流社会生活,了解其家庭生活方式。教堂也为青年侨胞举行各种诸如:音乐会、郊游旅行等社交活动。不仅使青年侨胞可以有正当消遣,且能结识朋友,建立友谊,也有利于婚嫁,从而对下一代侨胞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三、宗教文化对早期华人的影响

与东南亚华人不同,早期前往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是穆斯林,他们给东南亚带去了伊斯兰教,是传播者的角色。而澳大利亚作为西方社会,华人自始就注定是被融入的地位,宗教此时是一种向心力,是华人团体团结的精神支柱。宗教文化之于澳大利亚华人,终是融入与适应的问题。

为了能够长久生活在澳大利亚,长期定居于澳大利亚的华人都在缓慢地适应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主动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进行融合,在文化调适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另一方面在逐渐为澳大利亚社会同化,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边际人。

首先,宗教信仰对于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移民而言扮演着社会分化适应者的角色。社会分化导致世俗化,宗教事务逐渐变成个人私事。但宗教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下降,它为个人的生活提供终极关切。宗教系统对分化社会的适应并不等于被动接受现实,还包括以相对稳定的宗教价值观体系反作用于社会系统。澳大利亚华人传统宗教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也纷纷以自己的表现形态面对着处于分化过程中的社会,并以独有的演化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

其次,中华传统宗教是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精神团结的粘合剂。从信仰的内容和实质看,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观,并与宗法制度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宗教信仰体系。祖先崇拜在中国由于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并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

响。与自己有着血缘和心理情感联系的具有现世意义的祖宗神。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的宗亲团体因华人在澳大利亚生存问题应运而生,他们成立会馆,修建祠堂,祭祀共同的祖先,在精神上增加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有利于他们适应澳大利亚的新生活。

再次,基督教成为华人与西方世界沟通融合的桥梁。中华传统宗教观在早期澳大利亚华人世界里是一种固有的心理范型和精神态势,不可能轻易动摇。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更多的是在思想和文化上影响着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信教华人领读教义学习西方的思想,积极向善,摒弃了一些吸食鸦片赌博等恶习。基督教给予华人一个机会认识并学习了西方世界;同时,对于当时澳大利亚社会的种族歧视、排华政策等不公平待遇,早期受到基督教义及西方文化影响的华人掀起了争权反歧视的斗争。如华人牧师张卓雄上书政府,撰写小册子抗议华人的不公正待遇,积极参与1905年的抗美运动、抵制白澳政策等等。因此,基督教在早期澳大利亚华人间的传播伴随着华人对西方世界认识程度的加深,起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美]乔纳森·爱德华兹. 宗教情感[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 [2] 吴文华. 东南亚华人和宗教[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88 (4): 23-28.
- [3] 张禹东. 试论东南亚华人宗教的基本特质[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7 (S1): 26-32.
- [4] 黄新宪. 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渊源联系[J].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8 (2): 56-59.
- [5] 张禹东. 华侨华人传统宗教及其现代转化[J]. 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4): 99-106.
- [6] 旃媛媛. 从宗教信仰看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文化适应[D]. 云南师范大学, 2004.
- [7] Myra Willard. 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 [M].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8] 澳大利亚统计局. 1891年澳大利亚各州佛教徒及占总人口比例[DB/OL]. <http://www.abs.gov.au>.
- [9]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0] 黄昆章.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11] 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12] [澳]杨进发. 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年[M]. 姚楠, 陈立贵,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蔡宇安)